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教育工作

杨 燕 徐轶杰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留学教育工作是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复出后通过各种办法拓宽了我国留学教育的路径、发出了成千上万派遣留学生的号召、亲自打开了中美留学交流的大门;同时还改革不合理的经费、奖学金和人事制度,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了吸引留学生回国的一系列制度。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工作的开拓者、改革者和建设者。

关键词: 邓小平;留学教育;博士后;奖学金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工作的开拓者、改革者和建设者。以往研究由于文献所限大多集中于邓小平留学教育思想的分析和阐发,本文则根据最新解密的档案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从加快和拓宽留学生的派遣、改革不合理的留学管理制度、建设吸引留学生回国的制度等三个方面,解读邓小平对留学教育工作的原则指导和政策实践,进而阐明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工作所起到的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一、留学教育工作的开拓者

“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我国的教育和科技工作,使我国总体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科技人才呈现青黄不接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形势,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提出“要派留学生出去,”“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

然科学方面”。邓小平将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技术视为在科技领域追赶科技先进国家步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中国的留学生外派工作呈现停滞状态。从1972年开始,随着中国外交转向的需要,中国开始向国外派遣语言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但这些公派留学生多以语言留学生为主,少有学习科技的留学生。1973年至1978年中国通过教育交流渠道先后向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西德、瑞士、丹麦和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派出了90名科技生。这样的情况很难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对科学技术的需要。为了扭转这一状况,邓小平积极拓展中国的海外留学之路,是新时期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1.亲自出面请华裔科学家带中国学者出国学习
1977年,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回国访问。8月17日上午,在会见丁肇中前,邓小平提出

作者简介: 杨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徐轶杰,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根据笔者检索,邓小平留学思想研究的研究最早见于公开发行的刊物是冯云生撰写的《邓小平同志有关留学人员工作的论述》(《中国人才》,1994年第9期);研究中确定邓小平留学思想分析框架基础的是江波撰写的《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出国留学工作的思想》(《出国留学工作研究》,1997年第3期);近期的研究中有王学萍的《当代中国留学政策研究:1980—1984年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于海峰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留学制度研究》(2008年,东北师范大学)中与邓小平有关的研究。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③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页。

“先派几个人去丁肇中领导的实验室学习。要用外国的条件,来培养我们的科研人员。”与丁肇中的谈话中,邓小平主动提出请丁肇中带十几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去学习。

经过一系列讨论和协商,1978年1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的10名科技人员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DESY)在丁肇中指导下学习工作。这10名科技人员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对外派出的第一批科技进修人员。

与丁肇中会见后不久,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FNAL)的加速器专家、美国当时最大高能加速器的设计者美籍华人物理学家邓昌黎教授也回国访问。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邓昌黎,也提出要派科研人员到邓昌黎那里学习,“尽快派人去,学习回来后搞我们的建设”。经过邓昌黎的联络和安排,1978年5月,以谢家麟为首的10名中国科技人员抵达美国费米实验室开展学习与交流。

1977年,邓小平请华裔科学家带中国科技工作者去国外学习的途径为中国科技人员出国留学,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资源,为当时的中国在重点领域迅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打开了渠道。同时,这一举动的示范效应表明了中国对外开放对外学习的决心,促使海外华裔科学家纷纷回国为祖国建设提供帮助和便利,建立了一批留学特别项目,如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教授建立的“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华裔科学家吴瑞教授倡导建立的“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考试”项目、华裔科学家丁肇中倡导建立的“实验物理研究生项目”、华裔科学家陈省身教授倡导建立的“数学研究生”项目等。这些项目又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的留学之路。

2. 发出扩大留学的号召

邓小平亲自请华裔科学家带中国科技工作者去外国学习,虽然可以解决重点研究领域的部分问题,但是对于国家现代化的需要还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国家现代化的需要,邓小平号召要“成千上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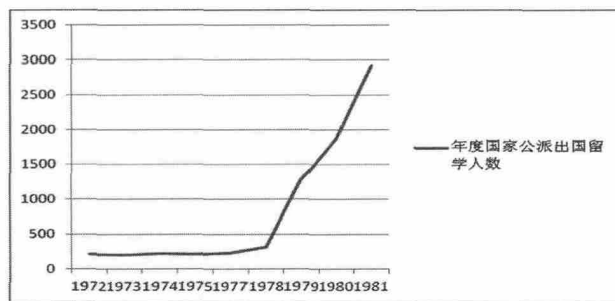
派遣留学生。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谈到清华问题时提出了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要求。他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他还叮嘱,“今年派3000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教育部放弃了此前原定的派遣200名科技生的计划,并于7月11日向国务院提出1978年选拔留学生5千至6千人,至少派出留学生3千名的计划。8月4日,教育部就发出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学生的通知》。8月21日至9月7日,教育部、外交部、国家科委召开了部分驻外使馆文化参赞会议,各驻外使馆积极支持加大留学生派出力度,并反映世界舆论认为中国大批派遣留学生的举措是“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使在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惊”,“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

邓小平的号召成为新时期中国留学政策的一个分水岭,此后留学生的数量呈现直线迅速增长的趋势(见图)。留学人员的规模也从“十个八个”发展壮大为“成千上万”。

1972-1978年度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统计图



3. 打开中美留学交流之门

当时的中美关系还没有实现正常化,这对我国派出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一个阻碍。邓小平则亲自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了中美留学交流的大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第219页。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9日。

张黎等编著:《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这10名科学家是:谢家麟、钟辉、隋经义、徐建铭、毛振琬、潘惠宝、沈宝华、王书鸿、肖意轩、陈森玉。他们日后大多成为中国高能物理的重要科研力量和领军人物。谢家麟:《谢家麟自传》,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513页,第375页,第690、691页。

1978年7月,面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扩张,卡特总统开始有意加速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派遣了总统科技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率领“美国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科技访问代表团”访华。起初,代表团仅提出50人的留学生名额。中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提出希望大幅度增加中国留学生名额。这完全出乎美方意料,由于没有预案,美方颇为尴尬,经过临时商量美方提出可以接纳500名中国留学生。方毅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祝酒时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在这样的氛围下,科技合作谈判进展顺利。

7月10日,邓小平会见了普雷斯代表团。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需要向发达国家,包括你们学习。”美方代表团成员阿金森(Richard C. Atkinson)问邓小平,“您是否担心一些中国学生也许一到美国就不回中国了?”邓小平以博大的胸襟和战略眼光表示,“可以预计到会有少数人不回国。不过中国人不是苏联人,中国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对祖国都是忠诚的。而且从长远考虑,那些没有立即回国的学生也是中国的一种财富。”邓小平在会谈时要求美方接受5000名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这一数字大大超越了代表团的权限,以至于普雷斯必须要在邓小平身边直接打电话给熟睡中的卡特总统请示,邓小平的提议受到了欢迎。

邓小平的积极态度直接推开了中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的大门。普雷斯使团回国后就邀请中方派遣高规格的代表团访美,继续就中美互换留学生事宜进行进一步的商谈。10月7日,中国教育代表团一行11人抵达美国,通过8天的艰苦谈判与美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口头谅解中明确了“美方

接受我方在1978至1979学年派出500至700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即进修人员),并同意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间进行直接联系。我方同意接受美方派来60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对于可能提供的任何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1978年12月26日,根据双方口头协议,中方派出了首批52名留学生赴美学习,中美互换留学生工作正式开启。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在会谈中还特别感谢邓小平为推进中美互换留学生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最终,在邓小平的关心下,中美留学交流的大门进一步打开了。

二、留学教育事业的改革者

1978年后,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已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但一些不合时宜的留学教育管理制度却成为阻碍留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邓小平多方协调有效地改革了留学教育管理中不合时宜的制度,扫清了留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事业的改革者。

1.改善对留学人员的经费支持

随着留学人员增多,留学管理问题日渐突出,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经费问题。邓小平关心留学人员的工作生活,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79年4月,邓小平指出,“留学生生活费太少,根本不能同外国学生交往,此事必须解决。”

当时留学生的国外经费使用制度还是依据1975年颁布的《关于试行派往国外教师、留学生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来执行。根据这一规定,出国教师在国外工作期间每人每月发给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而留学生则仅能拿到相当于1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①邓小平的批示显然是针对这

普雷斯使团有15名成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阿金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局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地质研究所等机构代表,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226;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第250页。

阮虹:《韩叙传:一个外交家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王波:《国门开》,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7日第12版;Richard C. Atkinson, Recollections of Events Leading to the First Exchange of Students,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3. 网址: http://www.rca.ucsd.edu/speeches/Recollections_China_student_exchange.pdf, 最后一次访问2015年4月21日。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第509页。

Richard C. Atkinson, Recollections of Events Leading to the First Exchange of Students,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4. 网址: http://www.rca.ucsd.edu/speeches/Recollections_China_student_exchange.pdf, 最后一次访问2015年4月21日。

Interview Former U.S. president: Mutual respect is important in U.S.-China relations, People Daily, Feb, 20, 2009.

①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第412-414页,第721页。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1977-1980) Vol.XIII.,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777.

种情况而言的。很快,留学人员也开始反映生活费不足的问题。

1979年5月30日,在德国留学的作家老舍的女儿舒雨写信反映零用钱不足,已经使中国留学生不得已只能削减朋友的活动,或找借口回避,以致于使外国朋友莫名其妙,产生了中国人不如其他国家的人那么好接近的印象,有损于中国人的尊严。舒雨的信经方毅报送邓小平。6月6日,邓小平作了批示:“请方毅同志商同有关方面,提出具体改进办法,迅速付诸实行。”

很快,相关部门修改了不合时宜的经费管理办法。1979年8月8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科委、外交部发出了关于试行《出国留学人员经费开支规定(国外经费部分)》的通知。此次修改生活零用费的额度进行了较大调整,提高了留学生生活零用费的金额:“每月发给进修人员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发给研究生相当于3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发给本科生相当于25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新的规定提高了留学生的生活标准,为他们在海外更好地学习提供了条件。

2. 废除奖学金上缴制度

1979年新的“经费开支”规定,虽然提高了留学生的生活费,但是仍然沿袭了1975年老规定中关于奖学金上缴的规定。关于奖学金上缴的规定很快就引起了足以导致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事业挫折的危机。

1979年9月30日,李政道教授致信方毅副总理,直言他本人对于奖学金上缴一事“大为吃惊,难以置信”。他在信中说:“国内有文件,要学生将部分经费上缴,假使这消息是真的话,这必然使将来派学生出国的这条路受极大的打击。……这是有害无益,因小失大,对四个现代化是很不利的事情。”方毅感到事关重大,10月14日将信转呈邓小平。10月20日,邓小平批示指出:“李政道的意见是正确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不妥的办法。”

10月26日,方毅召集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技干

部局的副部级干部开会,讨论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批示,改变现行不妥的办法。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由国家科委起草了由教育部、中科院、财政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外交部、国家科委等六部委联名签发的《关于拟改变对外留学人员、访问学者所得奖学金和资助费的处理办法的请示报告》[(79)国科发外字655号]并于11月3日上报国务院。11月初,邓小平批准了该报告并由国务院下发执行,其中规定:“凡我派往国外的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其国外所给予的奖学金、生活费或资助费用全部交由个人,用作学习和生活等一切费用。”

然而,国务院下达的文件在执行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国一些驻外使馆纷纷来电表示不好执行,认为“这样做会造成不公平和人为矛盾,留学人员所得不但会高出我们的援外人员及其他国外工作人员所得的国外发给的费用,而且会比大使得的钱还多,使馆人员想不通,甚至外交部、教育部也想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蒋南翔部长于1980年1至2月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奖学金是否归己”问题。会后由教育部执笔会同财政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外交部制定了《关于执行(79)国科发外字655号报告的实施办法》,规定:本人只能留下所得奖学金、资助费的一小部分,超出我国规定国外经费标准的20%以内的归个人;其他大部分仍需上交国家。这个“实施办法”实际上是没有把国外给的奖学金和资助费全部归己。

由于“实施办法”没有解决奖学金和资助费全部归己的问题,国外仍有强烈反映。中国两大留学生输出地联邦德国和美国的科研机构纷纷就奖学金问题表示异议,并准备削减对中国留学生的资助。德国洪堡基金会要求来华访问,并表示要谈奖学金归己问题。德国洪堡基金会代表说:“我们资助留学生是出于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你们嫌多,我们可以减少。”美国基特峰天文台台长给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琯院士来函说,他们在得知中国学者要把多余的钱上交国家后,要改变对中国学者的资助数额,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万美元减少到5000

《方毅传》编写组:《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9页,第590页,第588页。

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723页,第727、728页,第732页。

靳晓明主编:《国际科技合作征程(第四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页,第341、342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第556页。

美元,对再接受的访问学者就不给资助了。各主要派出科研机构的质疑和准备削减资助的表态使“奖学金是否归己”问题已经演化成一场关系改革开放留学事业成败的问题。

面对严峻形势,邓小平当机立断指出:“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外交、教育、财政部门一直不通,真难理解。”1980年9月,万里副总理主持召开了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财政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外交部、国家科委等六部委会议专门讨论“奖学金是否归己”问题。会上转达了邓小平的口信,外交人员是我国政府派出的官员,拿的是中国政府的工资,怎能同留学生的奖学金相比呢?万里副总理严厉地批评有些人不讲大局,是平均主义思想,是不顾国际影响,是见钱眼红。万里副总理说:留学人员奖学金和资助费所得超过大使有什么关系!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由国务院直接拟定了《关于修改出国留学人员、访问学者所获得的奖学金和资助费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指出,留学生所获奖学金和资助费一律交由本人支配。至此,在经过邓小平反复批示和关照后,奖学金归己这个几乎危及新时期留学教育工作的难题才得以解决。

3. 改革用人机制

随着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留学生陆续回国报效祖国。邓小平高度关注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改革各种不合理的人事制度,为留学生提供发挥能力的各种条件。

1983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第590期《情况汇编》刊登的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文章反映了归国留学人员李武强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拒绝外国高薪毅然回国。但回国后,由于中央一些主管部门相互推诿,以“等待分配”为由,本着“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直接将其分配回原工作单位——陕西省富县广播站。一位学“机器人”的留洋博士,由于专业不对口,

只能被分配去爬电线杆、架线,修理舌簧喇叭,往山上扛水泥袋子这样的工作,而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李武强本人为工作分配问题,三赴西安,两进北京,写了几百页材料却投诉无门。了解情况后,邓小平批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短短52个字,邓小平就连用了3个问号。

为了贯彻和执行邓小平的批示,中共中央组织部立即决定由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负责监督落实李武强的工作分配问题。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批示,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大检查、大落实工作,并于1983年12月27日由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进一步做好出国进修人员回国后专业不对口调整工作的通知》[劳人干(1983)82号]。《通知》援引了邓小平的批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的精神,对出国进修人员回国后的工作安排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于1984年2月前上报劳动人事部,专业不对口的要督促所在单位限期研究调整。1984年7月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组长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并听取了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对这次全国检查的汇报。邓小平同志特别关注这次的“国务院检查”,并亲自听取了中央书记处的汇报。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国家劳动人事部调配司司长亲自到延安地区办理了李武强的工作调动手续,分配李武强到机械部北京自动化所机器人研究室担任副主任。

邓小平对不合理人事制度的改革,正如中央劳动人事部的文件(1983劳人干字82号文件)指出:“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对于我们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进工作,开创人事工作新局面,指出了明确的方向。”^⑩

靳晓明主编:《国际科技合作征程(第四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第342页,第342页,第342页。

《方毅传》编写组:《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0页。

杨婕:《邓小平给一位小记者内参作的伟大批示》,《今媒体》2004年第1期,第33、34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5页。

杨婕:《小记者也能写出大参考》,《报刊之友》1997年第6期,第26、27页;李武强:《亲切的关怀深切地期望》,载本书编委会编:《春天长在 丰碑永存:邓小平同志与中国科技事业》,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⑩中共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流动调配司编:《知识分子政策文件汇编(1983—1988)》,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4—676页,第674—676页。

李武强 1984年后到机械部北京自动化所机器人研究室担任副主任;1988年调任到国家科委基础研究高技术司863联办副主任;后于1993年到国家科委基础研究高技术司自动化处调研员、处长;1997年到国家科委基础研究高技术司通讯处处长;11月份后,担任中国驻丹麦使馆科技参赞;后在2001年调入科技部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信息处处长;后担任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后调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高科技开发工作;后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美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科技参赞。

三、吸引留学生回国制度的建设者

随着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如何更好地为留学归国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研究氛围,如何更好地使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成为摆在中国留学教育工作面前的重要课题。邓小平承担起了吸引留学生回国制度建设者的角色,创建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吸引国外留学人员回国。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邓小平更是提出了“来去自由”的主张,成为新时期中国留学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

1. 博士后制度的建立

随着留学人员大批量地开始回国,如何进一步发挥留学归国人员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4年5月21日,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会见了李政道教授夫妇,讨论了建立博士后制度的问题。李政道表示,为了能安排好回国的留学人员,“希望国家拨款两千万人民币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的试点”。邓小平认为,“现在已出现回来的人不知怎么用的问题,使用不对专业,零零星星已有这个反映,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十个太少,回来几千人,还有其他专业,也要采用同样的方法”。“这是一个新的办法,成百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邓小平当即表示“明天就批两千万”。

1985年5月11日,原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7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标志着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7月16日,邓小平再次会见李政道。邓小平首先向李政道询问落实博士后工作的问题。李政道表示博士后每年日常经费目前规定为8千元增加到1.2万元比较合适。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并将原来博士后每年日常经费从8千元增加到1.2万元。1986年1月1日,瑞士留学

归国博士洪志良进入复旦大学电子学与通讯专业流动站,成为中国第一个进站的博士后。1990年4月,邓小平还亲笔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题词。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迅速发展,截止2012年中国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149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128个。博士后流动站的个数已经从当初的十几个发展为“成千”,经过30多年的不断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

2. 特区招聘留学人员机制的建立

博士后制度的建立部分地解决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问题,但如何使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发挥作用,邓小平又提出了“特区招聘留学人员”的要求,拓宽了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的渠道,促进了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1985年7月16日上午,邓小平又一次与李政道会面。邓小平强调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情上缺乏本领,各个领域都如此。现有人才不合拢来,丧失了可惜”。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加强同国外留学生的联系,科研机构要招聘最优秀的科研人员,要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要赶快搞一个规划”。

随后,在听取胡启立、方毅、宋健、严东生、周光召汇报时,指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外国,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博士后只是一小部分人,要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有许多框框束缚我们,要改革。招聘要有对象,有名单,要赶快搞规划。尤其是科学研究机构,现在就要去招聘,把最优秀的先招聘回来。所谓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这就是事实,要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最优秀的,招聘的条件要提高。”

经过不断的改革和摸索,1988年10月5日,深

李政道:《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1页。

记者:《李政道专访》,《中国人才(上半月)》2005年第11期,第13、14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工作文件资料汇编(1985—2007)》,中国人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2015年度博士后综合评估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2014〕204号,2014年12月9日,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地址:http://www.mohrss.gov.cn/SYrlzyshbzb/ldbk/rencaiduiwujian-she/zhuanyejishurennyuan/201412/t20141217_146555.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4月24日。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页,第1061、1062页。

李政道:《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圳市发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共17条,对留学人员到深圳工作给予户籍、住房、职称评定、经济收入、创办企业、家属工作和随迁子女就学等实施政策性优惠。因此,截止当年年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140多名留学生来人或来函联系要求到深圳服务。1989年3月2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广东省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安排试行办法》,鼓励和吸引出国留学人员来广东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邓小平提出的“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终于开始实施。

3.“不计前嫌,来去自由”号召的提出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致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骤然恶化。一些曾经参与过运动的留学生对回国有顾虑。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阻挠留学生回国,以争夺中国留学生中的优秀分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不计前嫌,来去自由”的号召,为广大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提供了政策保障。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说:“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

为了争夺中国留学生,美国众、参两院分别于1989年11月19、20日通过《中国移民紧急救援法案》,取消J-1签证的中国留美人员在学业期满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义务,严重违背了过去中美双方达成的有关教育交流的协议。事后,美国总统布什虽然否决了这项法案,但却于1990年4月11日,以“中国人回国会受到政治迫害”为由,颁布12711号“总统行政命令”允许中国留学生延长在美国的居留期限,致使部分赴美留学生滞留不归。

针对这种情况,1992年1月25日,“南巡”中的邓小平在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表示:“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怎样,回来我们妥善安排他们。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起码国内是相信他们的。”

在参观结束乘车前往拱北口岸的途中,邓小平说:“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有很多人很想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

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向邓小平汇报,广东省已制定了政策,欢迎留学生回来,也允许留学生再出去。邓小平说:“这个好嘛!这要有点胆量。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是要自由一点嘛。回来不适合,他可以走。事实上,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只要安排妥当,是不会出去的。”此后“来去自由”逐步成为新时期我国留学生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中央提出了新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1992年3月,李鹏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讲话中说,对近年出国的留学人员,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他们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对因种种原因仍在海外的人,也欢迎他们回国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参加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等方面的工作,国家从政策上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往返方便。这是国家第一次提出,已在国外的学成未归的留学人员可以回国短期交流,国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1992年8月17日发出了《关于在海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说明了邓小平“不计前嫌,来去自由”的号召。就“不计前嫌”而言,《通知》指出,“所有在外学习的人员,不论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包括在国外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一律不予追究,都欢迎他们回

(下转第34页)

深圳经济特区年鉴编辑委员会编:《深圳经济特区年鉴·1989》,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509页;忻福良主编:《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大事记(1978-1989)》,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李灏深圳特区访谈录》,海天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原《国际人才交流》1989年第1期。

广东省科委法制处编:《广东省科技法规选编(1980-1990)》,华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制,1991年版,第256、257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7页。

George Bush: "Executive Order 12711 - Policy Implementation With Respect to National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11, 1990.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a.edu/ws/?pid=23556>.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4月21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

梁广大:《珠海为官16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张双鼓、江波主编:《出国留学工作2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

道德水平要高,而且他们还必须具有美利坚民族的理想;第二,移民家族史必须健全、家族成员不存在生理或者智力缺陷。

作为优生学权威人物,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移民委员会”主席阿尔伯特·约翰逊的“座上客”,拉弗林思想和主张对美国移民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学者雅各布逊对此曾作了相当精到的分析。他指出,20年代移民法中所隐含的优生学观念,既体现了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种族归类法,又进一步构建了这种“非我族类”之思想。雅各布逊认为,“1924年移民法的排外逻辑,并不代表美国政治文化中种族观念的重新调整,而只不过是讨论所谓的良好公民问题而对种族做了更精细、更微妙的界定”。也许更令人深思的是,美国20年代的移

民法,居然可以用优生学和进化论之类的“科学”思想来包装其种族主义思想,然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其合法性。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当时的政治气氛,即基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大熔炉”思想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说明美国历来对种族主义持容忍、开放态度,甚至是怂恿和鼓励的态度。优生学之所以能够体现在20年代的移民法上,固然有其所谓的“科学真实性”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当中存在着广泛的种族主义歧视观念。当基于种族主义观念的优生学观点提出之后,普通民众便可以心安理得地以“科学真实性”为自己的种族歧视观念辩护,并进而以此为正当理由支持种族主义导向性的移民法及其相关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国会20年代通过的移民法有其历史必然性。

转引自 Desmond King, *Making Americans*, pp.194-195.

M.F. Jacobson,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7.

(上接第101页)

来。即使参加了反对中国政府的组织,从事过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人员,只要他们退出了这些组织,不再从事违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反政府活动,也都一律欢迎回国工作。”就“来去自由”而言,《通知》提出:1.在外学习人员护照过期,一律给予延期;2.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只要他们持有我国有效护照和外国再入境签证,无须再履行出国审批手续,可随时再出境;3.留学人员回国后的工作,按“双向选择”原则,可回原单位工作,也可自行联系工作,包括进入“三资”企业工作或自行开办企业等;4.允许留学人员家属申请出国探望留学人员,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审批。

同年8月23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长春与高等学校师生座谈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应该成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对出国留学人员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欢迎他们采取多种方式参加祖国建设。自此,“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成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

综上所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工作的开拓者,是不合理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者,是吸引留学生回国制度的建设者。邓小平留学思想和实践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留学教育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6页;于富增、江波、朱小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84页。